



香港城市大學
中國文化中心
www.ccc.hku.edu.hk

九州學林

2010 · 春夏季
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

九州生氣恃風雷，
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
不拘一格降人才。

龔自珍詩



上海人民出版社



香港城市大學
中國文化中心
www.cccv.cuhk.edu.hk

九州學林

2010 · 春夏季
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九州学林. 2010. 春夏季/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
中心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571 - 7

I. ①九... II. ①香... III. ①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丛刊 IV. ①K203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920 号

責任編輯 周 珍
特約編輯 劉大立
封面設計 儲 平
技術編輯 伍貽晴

九州學林(2010・春夏季)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編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20 × 1000 1/16 印張 21.5 插頁 3 字數 324,000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571 - 7/G · 1387

定價 42.00 圓

本學報版權為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所有。除獲本中心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學報文字或圖表。

Articles appearing in this journal are abstracted and indexed in HISTORICAL ABSTRACTS and AMERICA: HISTORY AND LIFE

ISSN: 1729—9756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Chinese Civilisation Centr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Phone: (852)34422477

Fax: (852)34420508

Email: jiuzhou@cityu.edu.hk

Web Site: <http://www.cciv.cityu.edu.hk/publication/jiuzhou/>

編輯委員會成員(按姓氏筆劃序)

王元化 (華東師範大學)	朱維錚 (復旦大學)
余英時 (普林斯頓大學)	吳宏一 (香港城市大學)
李歐梵 (香港中文大學)	李學勤 (中國社會科學院)
李澤厚 (哲學家)	杜維明 (哈佛大學)
汪榮祖 (臺灣“中央大學”)	周振鶴 (復旦大學)
周質平 (普林斯頓大學)	林毓生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
孫康宜 (耶魯大學)	宿 白 (北京大學)
張信剛 (香港城市大學)	張隆溪 (香港城市大學)
張 灝 (香港科技大學)	許倬雲 (匹茲堡大學)
章培恒 (復旦大學)	傅 申 (臺灣大學)
湯一介 (北京大學)	葉嘉瑩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葛兆光 (復旦大學)	裘錫圭 (復旦大學)
劉再復 (香港城市大學)	劉述先 (臺北“中央研究院”)
鄭培凱 (香港城市大學)	興膳宏 (京都大學)
龐 樸 (中國社會科學院)	羅多弼 (斯德哥爾摩大學)
饒宗頤 (香港中文大學)	

常務編委(按姓氏筆劃序)

朱維錚、張隆溪、鄭培凱

主編

鄭培凱

副主編

范家偉 (香港城市大學)

Advisory Board

Chang, Hao

HK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eng, Pei-ka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u, Shen

Taiwan University

Hsu, Cho-yu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Kōzen, Hiroshi

Kyoto University

Li, Xueq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n, Yu-sheng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Liu, Zaifu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ang, P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 Bai

Peking University

Tang, Yijie

Peking University

Wang, Yuanhu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 Hung-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u, Ying-shih

Princeton University

Zhang, Peiheng

Fudan University

Zhu, Weizheng

Fudan University

Chang, HK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ou, Chih-p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Ge, Zhaoguang

Fudan University

Jao, Tsung-i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e, Leo Ou-fa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 Zehou

Philosopher

Liu, Shu-hsien

Academia Sinica

Lodén, Torbjörn

Stockholm University

Qiu, Xigui

Fudan University

Sun, Kang-i

Yale University

Tu, Weiming

Harvard University

Wong, Young-tsu

Central University

Yeh, Chia-ying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Zhang, Longx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Zhou, Zhenhe

Fudan University

Editorial Board

Cheng, Pei-kai

Zhang, Longxi

Zhu, Weizheng

General Editor

Cheng, Pei-kai

Associate Editor

Fan, Ka-wai

目 錄

論 文

吳展良	實踐與知識：朱熹的早期學術取向析論	___ 2
楊雨蓓	天學問答 ——十八世紀朝鮮文人安鼎福的辟邪論說	___ 46
馬幼垣	美國艦隊清末兩訪廈門史事考評(下) ——為美國大白艦隊訪問廈門一百週年而作	___ 69
陳志峰	方孝孺殉節原因考論	___ 137
陳永明	雍正朝《明史》的編纂	___ 153
司 佳	見聞、談資與諷刺詩 ——中國洋涇浜英語在十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出版物中的流傳	___ 172

考 釋

許子濱	《左傳》“經皇”釋義 ——從高本漢《左傳注釋》談起	___ 192
程 芸	《燕行錄全集》演劇史料輯錄	___ 215

論 壇

姚繼斌	鄭和與國史教育：從清末和民國中國歷史教科書談起	___ 264
-----	-------------------------	---------

書 評

韓 巍	探尋西周王朝的衰亡軌跡 ——《西周的滅亡》讀後記	___ 288
黃海濤	第一部英國漢學史專著 ——評熊文華《英國漢學史》	___ 298

編後記

鄭培凱	人文研究的終極意義	___ 324
-----	-----------	---------

Article

WU Chan-Liang	Praxis and Knowledge: An Analysis of Zhu Xi's Learning in his Early Years	___ 2
Yang Yu-lei	Some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Catholicism: a Study of Korean Scholar An ChongBok's Criticism of Christianity in 18 th Century	___ 46
MA Y. W.	The 1908 and 1910 Visits of American Squadrons to Xiamen	___ 69
Chan Chi-fung	A Study of Fang Zhengxue's Suicide	___ 137
Chan Wing-m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i>Ming History</i> in the Yongzheng Period	___ 153
Si Jia	Accounts, Anecdotes, and Travesties: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Pidgin English in Western Publications from the Eighteenth to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___ 172

Textual Studies

HSU Tzu-pin	A Critical Study on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ord "Diehuang 經皇" from the <i>Zuozhuan</i> with an Emphasis on Bernard Karlgren's Annotation	___ 192
Cheng Yun	Historical Data of Opera Recorded in Yǒnhaengnok chŏnjip 燕行錄全集	___ 215

Forum

YIU, Kai Bun	Zheng He and National History Education: A Study on the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of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___ 264
--------------	---	---------

Reviews

Han Yi	Review on Li Feng's <i>Landscap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 The Crisis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Zhou 1045—771 BC</i>	
Wong Calvin HT	Review on Xiong Wenhua's <i>Yingguo Han xue shi</i>	

九州學林

論文

吳展良 實踐與知識：

朱熹的早期學術取向析論

楊雨菁 天學問答

——十八世紀朝鮮文人安鼎福的辟邪論說

馬幼垣 美國艦隊清末兩訪廈門史事考評（下）

——為美國大白艦隊訪問廈門一百週年而作

陳志峰 方孝孺殉節原因考論

陳永明 雍正朝《明史》的編纂

司佳 見聞、談資與諷刺詩

——中國洋涇浜英語在十八至二十世紀西方出版物中的流傳

實踐與知識： 朱熹的早期學術取向析論

吳展良 臺灣大學歷史系

摘要：朱熹看重知識的學術模式如何產生？此模式與理學素重實踐的傳統之關係如何？其學術中實踐與知識孰先孰後？孰為究竟第一義？這些問題一直是有關程朱陸王乃至宋代學術思想史研究的關鍵議題。本文分三階段仔細研究朱熹的早期學術取向，試圖對這些問題有所釐清。研究發現朱熹很早便立志學聖人，以追求做人處事的最高境界為其人生目標。其天性雖頗具知識性的長才，然而其所學從來不止於書本。在家庭與師長的影響下，其學既重視隨時的實踐體驗，又指向嚴於出處進退，以性命相見的終極踐履。他十五、六歲之後，因學聖人不得其門而入而開始參禪。禪學主張當下即是，不立文字。朱熹所學又為主張破除一切知見的“看話禪”，重點完全在實踐上。然而細讀有關文字，卻不難發現朱熹早年的禪學仍大有談玄說妙之處。在此期間，他仍頗用力於讀書與學聖賢，然而受到禪學的影響深重，用心偏於向內尋求一貫之道。朱熹二十四歲開始任官後，受到實際政務的歷練及李侗的影響，重新致力於經典與二程學統之研習，由是而回歸儒學。他最後所開出的成聖道路，主張必須徹底窮究與效法聖人的一言一行，並學習聖人明白天下一切事理且付諸實踐的本領，以達到做人處事的最高境界。在實踐與知識上都對自己做了最高的要求，因此打破了兩者之間易有的矛盾。盡精微而致廣大，日後終於大成其學。綜觀朱熹早期三階段的發展，可知他的知識傾向相當強烈，然而其目標卻一直指向實踐，學習方法上也一向重視實踐，因此實踐才是他為學的第一義。他所接受的理學乃至禪學傳統所追求的知識乃是做人處事的知識。此種的知識，源於人生實踐也勢必回歸人生實踐，因而不僅以實踐為目標，在學習知識過程中，也必須時時透過實踐來體察所得的知識是否正確。雖然如此，青年朱熹曲折的學習經歷，卻又讓他深深感到為了實踐成聖的目標，知識是不可或缺的媒介與指南。學者若不一一明辨各種具體事物的道理，很容易各以其所得之道為是，是故必須追求聖人境界的真知識才能避免一己的限制。對朱熹而言，此種真知識源於人人本有的虛靈不昧之心，反映實相，而有其客觀獨立的價值。實踐與知識，並非真正二分，不僅互相融入，亦指向最高的統一。

關鍵字：實踐、知識、朱熹、學術取向、理學、儒學、禪學、聖人、道、朱松、李侗

一、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

儒學傳統重視實踐，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乃至於孔子，所代表的主要是一個實踐的傳統。^①五經的內涵，若論其原始，則為先代“聖王”得位行道之跡，是對於成就盛德大業者的實踐紀錄。^②知識在儒學的傳統中雖然非常重要，然而其地位似乎次於或至少不能獨立於實踐。純知識的探索既非儒學的出發點，亦非其終極目的。《論語》所記的“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以及“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已明顯表現出這個意涵。不僅儒學，佛家的佛、菩薩，以及道家的真人、至人，亦莫不從其實踐的成績來衡量其造境。而知識在道、佛兩家的傳統中，更處於次要的地位。宋代理學家繼承了儒家乃至佛、道兩家的傳統，亦首重實踐與體驗。北宋理學大宗師，如周敦頤、程顥，均不著書，只寫了少量文章。張載、邵雍、程頤雖有著述，分量也不多，且多偏於易學一類，以講明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為目的。到了南宋，一般理學家也很少寫書，唯獨朱熹是個例外。他一生著述宏富，古今罕有其比。所以我們首先要問，朱熹的學術是如何從這個傳統中間變化出來的？亦即朱熹這樣一個看似“重知識”的思想或行為模式，是如何產生的，它與儒學以及理學重“實踐”的傳統之關係究竟如何？

3

學術史及思想史學界長期認為陸王之學以實踐為宗綱，而朱熹之學則強調知識性的探索。甚至認為朱熹企圖用對於所謂客觀、外在知識的認識，來指導其

①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道統相承的說法雖成於宋代，然而儒者好言堯舜禹湯等聖王，其事實起於先秦而非後世。以傳統觀念言之，《詩》《書》所載亦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創之業及所垂之統。孔子雖不得位，不在聖王之列而僅以其言行傳世，為儒家始祖。然而孔子所志在於一新周世，一生汲汲於行道，其個人所學又以“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最高境界，則其學術似仍以“實踐”為依歸。

② 此說雖出於清人章實齋，然其淵源甚古，《文史通義》論之已詳。漢人所謂復古更化，獨尊儒術，所尊亦在三代之制，而非儒家思想。其所謂經，皆古先聖王所垂之言行法制，而非理論或知識。

人生社會一切的實踐。^①朱熹學術思想中實踐與知識之關係如何？孰先孰後？孰為究竟第一義？一直是有關朱熹、程朱陸王，乃至宋明思想史研究的關鍵議題。對此學界長期傾向於採用陸王重實踐，朱熹則偏重知識或兼重知識與實踐的簡單說法。然而若深究其實情，則絕不如此簡單。實踐與知識在朱熹的學識思想中不僅複雜相涵，而且是一個與其具體生命經歷不可分，並反映出其人生與學思之多樣面向的歷程性與整體性問題。不深入研究朱熹的成學歷程，將無法明白實踐與知識在朱熹學術中的具體關係。

另外，儒學大傳統雖以德行、實踐為先，文事、知識為後。然而有關德行與實踐的知識，自孔子以降，在儒學傳統中卻有非常高的地位。朱熹所開出看似重知識的學術取向其究竟關懷為何？其所研習的知識是否為了實踐而存在，還是具有客觀獨立的地位？這也是研究中國近世學術思想史所不能不面對的根本性問題。儒學與理學傳統，本來偏向實踐，既有前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經典說法，又有德行之知與聞見之知的基本分野，而少見獨立構成且綿延發展的知識體系。所謂聖賢，均以做人處事的實際情況為標準，而非徒見於文字言論。前輩理學大師，均致力於成聖成賢，著書不多。朱熹建立新傳統並啟發了無數後學，其所創造的求知途徑的性質與意義，亦有待深入探索。限於主題與篇幅，本文對此問題雖然不能充分處理，卻可提供不少重要的線索。^②

不僅如此，關於實踐與知識的探索，既是研究宋明乃至中國學術思想史的核心問題，也是當代學術界所關心的一個基本議題。實驗主義與詮釋學這兩大當代顯學，都對知識與實踐(Praxis)之間難以分離的關係，提出深入的探討。^③當代的思想界大師如 Richard Rorty, Michel Foucault, Maurice Merleau-Ponty, 乃至新馬克思主義，現象學，後現代主義者對於傳統知識的觀點、純粹知性的限制、

① 此為馮友蘭及牟宗三先生一系的說法，詳見下文。

② 若一切以實踐為核心，則知識最終也是為了實踐而存在，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不可離實踐而獨立研討做人處事的知識。此種以實踐為依歸的知識是否仍有所謂客觀的價值，仍有待深入分析。若言客觀性，則其客觀性的基礎為何？所謂可靠的知識之標準為何？也必須明確有所指示。然而此問題牽涉太廣，根據朱熹的成學過程，本文雖能提出初步的看法，卻無法徹底處理，而有待於他日。

③ 參見 Robert Hollinger,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5).

實踐的重要性及實踐主體與認識客體之間難以分離之關係，亦不斷提出論說。是以本文所探討的問題，在當代學術及思想界，亦有相當的重要性，可作為進一步比較研究的基礎。

要探討前述所謂“重知識”的轉折，以及朱熹思想中實踐與知識的關係，最好的方法，應為對於朱熹成學的過程作一深入的探究。朱熹中年以前的學術發展可以分成四個階段。他的父親與其父親的摯友都崇尚理學，所以朱熹自幼在理學與儒學的傳統中長大。然而他十五六歲時從儒學與理學的傳統轉而醉心於禪學，開始進入一個參禪修道而兼治理學的階段。到了二十四五歲之後，才從禪學轉而致力鑽研經典，由是而回歸儒學。最後則是在三十七歲之後參究“中和問題”幾達三年，終於大成其學。其中最早期的三階段，其實已經決定了朱熹學術的基本方向與大致內涵，而且均直接聯繫到朱熹對於知識與實踐的不同態度，而成為我們研究此課題的絕佳場域。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不僅注意朱熹本人的言論，也注意影響其學術方向各種要素。朱熹早期的學術取向，與家庭及師長有極密切的關係。其父朱松於亂世之中謹守出處進退的分寸，大節凜然。他服膺二程學，並曾從學於二程再傳弟子羅從彥。其父親的好友如劉子羽、劉勉之、劉子翬、胡憲、李延平等，及他們所往來的方外之士，則是影響了朱熹一生學術方向的師長。因此本文在探討朱熹這早期學術時，特別注重其家庭暨師長的立身處世以及學術取向。這些人的學術一直深受二程學脈與禪學的影響，因此在研究時，當然必須注意程學與禪學在南宋的發展與遭遇。另外，要研究朱熹早期學思的轉變，當然不能忽略他在這些時期身份的自我認定、從事的工作，所擔任的官守、家庭的狀況，以及整體政治與社會的情形。因為這些事物，在在與他對於實踐與知識的態度相關。本文希望融合這些要素，從而對於朱熹早年的學術取向，有一個更完整的理解。

5

二、研究史的回顧

要認識朱熹早期的學術取向，首先必須細究其具體的發展歷程。此具體歷程，至今仍可詳細考察。除朱熹文集、語類中大量文獻，時人來往書信及當時有

關記載可供參考外，古人如李方子、王懋竑、夏炘對朱熹成學的過程，已多所考訂，惜多偏於中、晚期。近人錢穆先生所著《朱子新學案》中《朱熹從遊延平始末一附朱熹早年自述語》、《朱熹論禪學上下》、《朱熹論未發與已發》、《朱熹論涵養與省察》諸篇，對於朱熹早期的學術思想，首先加以考論。其中於朱熹從遊延平前後學術發展之曲折往復，考釋尤詳。惟於其參禪修道及其二十四歲之前之發展，雖有所論列，卻仍屬簡略。然該書於朱熹在早期所下之功夫及所窮研之義理，常有深切之說明，非常值得吾人重視。另外，當代學者束景南先生以畢生之力所著之《朱熹年譜長編》，收羅宏富，於朱熹一生學術思想著述之進程，及其家庭、師長、交友、出處及相關事情莫不詳考，極便於學者研究朱熹學術思想之發展。而其所著《朱子大傳》一書，企圖對朱熹之一生作一綜合陳述，亦深具參考價值。

除此之外，近人牟宗三先生所撰《心體與性體》一書，有部分章節探討了朱熹成學與參究中和的過程。對朱熹之學思有其哲學化的解釋，然考據不甚精詳。其後劉述先先生所撰《朱熹參悟中和問題所經歷的曲折》一文，義理多採牟先生，考據則多採錢先生，企圖為一綜合的說法。另外蔣義斌所著《朱熹排佛與參悟中和的經過》，則注意到朱熹之早年所習之禪學與其參悟中和問題之關係。以上作品對於朱熹學術轉變之過程雖頗有發明，彼此之看法卻不免時相衝突。關於許多書信與文字寫作時間的考訂，也因作者對於朱熹思想、義理之認識而有所不同。其中有許多的問題，必須釐清。尤其重要的是，前人之研究雖頗有成績，卻未曾特就“實踐與知識”這一課題作辨析。是以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此過程與問題特別加以深入的考訂及研究。

此外，有關朱熹學術取向的基本特質之論述亦不少。錢穆先生的鉅著《朱子新學案》雖然不曾直接提出“實踐與知識”這種現代化的問題，卻不斷在其文字中，表達了朱熹在實踐與知識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與成就，以及兩者密切的關係。另外，余英時先生的大作《朱熹的歷史世界》，大力批評了不少當代學者將理學變成了一種哲學或純知識探究的觀點，並有力地指出朱熹所學絕不只是純知識的探索，而終生有其政治社會實踐上的興趣乃至投入。該書主要就朱熹的政治與社會實踐立論，與本研究偏就朱熹的學術發展與取向之研究有所不同。然本文之旨趣與研究方法，實有學步余先生之處。

另外，直接析論朱子學術取向中所呈現的“實踐性與知識性”的，有以下作品：后藤俊瑞，《朱熹の實踐哲學》（東京：目黑書店，1937）；后藤俊瑞，《朱熹の倫理思想——續朱熹の實踐哲學》（西宮：后藤俊瑞博士遺稿刊行會，1964）；荒木見悟，《朱熹の實踐論》，《日本中國學會報》第1期（1950，東京）。其中前臺北帝大教授后藤俊瑞的作品，大力發揮中國哲學與朱熹學術中理論實為實踐之從屬一義，甚有見地。然而如此立論，似不免對於朱熹之實踐與理論的複雜及具體關係，及其實踐不能沒有理論與知識支持之事實，未能發明。而且該書分本體論、生成論、意識論全面分析朱熹“實踐哲學”的哲學結構與內涵，純屬哲學分析，與本文的取徑大為不同。荒木見悟《朱熹の實踐論》一文的重點，則在於解析朱熹關於人生實踐的各種思想。雖頗有可取，亦未能將此問題放在朱熹“真實的人生過程”中加以研究。這些作品原作的時間都超過了半世紀，且未曾如本文針對朱熹學術思想的真實生命歷程立說，所以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此問題。

另外如馮友蘭先生的研究，則認為朱熹的學術混淆了知識與實踐應有的關係。馮友蘭認為朱熹的格物思想：將增進“客觀上各個具體事物的知識”與提高“主觀上的精神境界”混為一事，使“‘明明德’不是從自己本身做起，而是從外物做起了。”並認為朱熹對於“窮物理”與“窮人理”之間的“關係認識不够全面”。這使得“他（朱熹）的意思在理論上有講不通的地方，在實踐上也有行不通的地方。”^①然而，據筆者的研究，反而可能是馮先生從一開始沒弄清楚朱熹所窮之理為何。對於朱熹而言，格物所得之理，本來就是屬於人的“處物之理”，或曰事物對於人所呈現出的性質，以及人如何處理具這樣性質的事物之道理。在這個意義上，實踐與知識，主體與客體，內與外有交融的關係。^②不能簡單地用笛卡爾、培根、康德以降，心物二分，主客體對立，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二分的現代認識觀加以抹煞。

①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5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168—172。

② 參見《朱子的認識方式及其現代詮釋》，收入氏著《中國哲學與文化》，第1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61—194；《朱子世界觀體系的基本特質》，收入《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8期，2008年，頁135—167；《聖人之書與天理的普遍性：論朱子的經典詮釋之前提假設》，收入《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4年，頁71—95。

牟宗三先生對於朱熹的認識觀則持有類似且更進一步的懷疑。牟先生用所謂“外在知識”與“道德主體”，或“外延的真理”與“內容的真理”的區分，來析論中國哲學根本特性，並判分理學各家的高下得失。^①他從康德式“外界知識”與“道德主體”二分的前提出發，認定朱熹的道問學之路不行。^②他根本上認為朱熹所有的學思屬於靠知識來逼近義理的“橫攝體系”，與真正從性體與道體流出，實踐性的“縱貫體系”有本質上的區分與無法跨越的鴻溝。^③然而牟先生這種說法，過度受到心與物、知識與實踐、主與客對立的西方認識論與世界觀的影響，從而誤解了程朱陸王的對立，也未必有當於朱熹學之實。對於朱熹早年為學的過程，亦缺乏相應的理解。^④另外當代名家如劉述先、陳來關於朱熹學的看法，頗受馮、牟兩先生說法的影響，也認為朱熹學偏重客觀知識，而不屬於實踐性的縱貫體系。^⑤凡此說法，似乎都未能就朱子學術及生命歷程中實踐與知識具體而密切的關係加以分析，所以不免都落入了簡單的二分法。

三、第一階段：指向實踐的知識：讀書學聖人（約十至十六歲）

朱熹早期的學思歷程可分為三階段：一、儒家教育（十至十六歲）二、參禪修道（十六至二十四、二十五歲）三、由釋歸儒（二十五歲之後）。每一階段各有其特色，而其中各階段的轉捩時期又最值得注意。朱熹對於自己第一階段的學思歷程，曾說過下面一段非常重要的話：

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

① 此分法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頁15—16，20—43，又見於《心體與性體》，卷1，臺北：正中書局，1981，頁38—41，44—51；卷3，頁48—49，352—353，476—483。

② 《中國哲學十九講》，頁15。

③ 參見《心體與性體》，卷3，頁48—49，352—353，476—483。

④ 牟宗三先生分析朱子參見延平一事，注意力完全在於思想內部的問題，而未曾析論讀經典與日用實踐對於朱子學思所發生的整體影響及其意義所在。至於朱子參見延平之前的讀經與學思歷程，更是簡單帶過。牟先生書中亦曾仔細分析朱子對於四書乃至其他經典的義理之解讀，然而着重點在於建構朱子三十七歲以前的“義理系統之型態”。其所謂“橫的靜攝系統”是否能得朱子學之真固然有待進一步研討，然而該書所重在於朱子的思想體系與型態，與本文的重點顯然不同。（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3冊，頁1—70）至於本文所涉及的各種義理問題，筆者所見實與牟先生亦有根本性之不同，在此難以具論。

⑤ 參見陳來：《朱熹哲學研究》，第1章，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